

辛 树 帜 先 生 传 略

刘 宗 鹤

(北京农业大学农经系)

〔编者按〕 今年是我院建校五十周年，也是我院创办人之一的首任院长辛树帜先生诞辰九十周年。为了庆祝校庆，缅怀先驱，本刊特将我院农业经济系前任教授刘宗鹤同志（现为北京农业大学教授）撰写的《辛树帜先生传略》一文刊出，以志纪念。辛树帜先生一生热心教育事业，对西北的教育事业和西北农学院的诞生和发展，都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学术上的成就也是很广泛的，尤其在动、植物学和古农学的研究上，很有建树，是一位可敬的教育家、生物学家和农史学家。他在办学和治学方面的精神和事迹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的。

※ ※ ※

辛树帜先生（1894—1977），字先济，湖南临澧人，生物学家，教育家。

先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赁居地主严姓庄屋，佃耕地主田地，幼年为牧牛童。放牧时经过村中私塾，闻朗朗读书声，心向往之。父母不忍拂其意，九岁始送往私塾就读。先生天资敏捷，记忆过人，塾师奇其才，怜其家穷，免费随班读书，数年后，嘱投考学校，继续学习。寻遭父丧，赖母、兄维持生计。先生不因此而稍减其发奋向学的意志，克服种种困难，先后以公费就读于常德第二师范、武昌高等师范。毕业后，在长沙明德中学、长郡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担任生物教员。

1924—1927年以自己数年积攒的薪金，并得到师友资助留学欧州，在英国伦敦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专攻植物分类学。归国后，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生物系主任。在1928—1931年期间，曾组织一个大规模的采集队，深入广东北江瑶山、广西大瑶山、贵州梵净山、海南岛及湘西等地，采集了几万号植物标本和上万号鸟类、兽类及爬虫、两栖的标本，建立起动物标本室和植物标本室。在此期间购买了整套的研究动、植物的期刊图书，出版了十几册的丛书，使中山大学在卅年代初期就为德、法、英、日等生物学界所熟悉。先生在采集中发现了不少动植物和爬虫的新种，其中经国内外学者鉴定，以辛氏命名的就有二十多个，如瑶山鳄蜥（*Shinisaurus crocodilurus*）、鳄蜥亚种（*Shinisaurinae*）等。先生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只要有心向学或者有一方面才能的，他都想办法给予帮助，如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古农学家石声汉教授、华南植物分类专家吴印禅教授、鸟类学家任国荣教授等都曾担任他的助教并由他送往国外深造。中山大学张宏达教

授说：“中大生物系60年来，就是辛先生最有贡献，我们常说他是我系最好的系主任，有许多优点和长处，值得后人学习，一个优秀的学者，不仅能读书，还会办事，尤其在今天我们需要无数能象辛师这样德才兼备的人。”由于先生在华南动、植物分类学上的贡献，曾被推选为中国动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植物学会理事。

1932—1936年担任南京国立编译馆馆长，主管全国图书编译出版工作。在此期间，他重点抓了两项工作：一是科学名词的规范化，为此，组织力量编译科学名词，统一科学名词，为我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做了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二是编译各种名著，例如《黄河志》等。还办了《图书评论》，评论已经出版的书刊。

陕西武功为我国古代农业的重要发源地，先生与人联名倡议在这里兴办一所高等农业学校，为西北培养人材。1936年先生不顾当时西北条件的落后和创业的艰难，毅然辞去国立编译馆馆长的职务，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后改为西北农学院）第一任校长。在延聘人材，兴建校舍，购置图书仪器设备上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武功已发展成为西北农业教育和科研的中心。先生在办学上作风民主，每周定期到各系和师生举行座谈，听取意见，并坚持清早和学生一起作操，因此，不仅对教学情况了若指掌，而且对教师甚至于大部分学生也是十分熟悉的。当时许多学生现已成为我国农业战线的骨干，他们对老院长的这些事绩，至今犹津津乐道。

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排挤下，先生逼迫离开西北农学院。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过农林局顾问、中央大学教授兼主任导师（相当于大学顾问），并曾受聘为参政会议的参政员。后因母年迈多病，辞去各种职务，回乡亲侍汤药。乡居期间，先生深感澧水流域经济文化落后，大力提倡兴办教育，省立第十四中学、翊武中学、九澧中学和津市农校的筹建，先生都曾积极参与，大力支助。1945年被推选为湖南省教育会会长。

1946年担任兰州大学第一任校长。先生认为办好兰州大学这所具有五个学院的综合大学，对于整个西北的教育事业至关重要，而要把兰州大学办为西北教育的首府，也要处处着眼于西北教育的全局。从这样一个战略的眼光出发，他力争在兰州大学设立了兽医学院、藏语系、俄语系等院系。当时教育当局拟将西北师范学院、兰州西北农专并入兰州大学，先生考虑到西北教育不发达的情况，几所高等院校并存的布局，有利于相互促进，特别是一所独立的师范院校在提供中等教育师资，为办好高等教育准备条件上，将发挥重大作用。因而，力排众议，保全了这两所院校。事实证明，先生的上述考虑是完全正确的。创校之初，先生重点抓了两件事：一是搜集人材，从京沪和全国延聘了大批专家教授来校执教（由于兰州僻处西北，国内著名学者不易前来，为此，又采取了短期讲学的办法，延请顾颉刚、石声汉等教授来兰州开设讲座，大开学术风气，深受师生欢迎）；二是购置图书仪器（兰州大学图书馆在短短三年中就搜集古今图书十万册左右，一跃而居当时西北各高等院校之首）。

解放前夕，先生不顾个人安危，不屈服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威胁利诱，毅然留在学校和全体师生一起参加护校活动。由于先生坚持留下，人心安定，在这变动的重大关头，没有一个人逃离，校产没有受到重大损失。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到先生对人民教育事业的重大功绩以及他以祖国和人民为重的凛

然正气。

全国解放后，党鉴于先生在西北教育的业绩，任命为西北农学院院长。在近三十年期间，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培养农业人材，门墙桃李遍西北。先生还担任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并被推选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

1951年，先生担任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副团长、西北分团团长，前往友好邻邦朝鲜，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先生爱国心重，亲临战火纷飞的前线，把西北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心意带给了英雄的人民子弟兵，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交给的重任。

先生大半生从事农业教育，深感整理祖国农学遗产的重要性，他曾在全国政协的发言中，系统地提出了整理我国古农书的意见。从1952年开始，经先生的奔走努力，联络了全国的古农学知名学者，开展我国古代农业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1955年农业部召开“整理祖国农业遗产座谈会”后，在先生主持下，西北农学院成立了古农学研究室。虽然人力缺乏，图书资料不足，这个研究室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整理了数十种古籍，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专著和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先生在古农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禹贡新解》和《中国果树史研究》等。《禹贡新解》是在深入考证《禹贡》这部古籍的基础上，从水土和贡物入手，进行古农学系统研究的著作。写作过程中，曾与国内知名学者就一些问题反复研讨，古史学家顾颉刚教授对这部专著评价很高，誉之为“博大精深”。《中国果树史研究》是一本博览古籍、集各家之言的农史著作，首次在这个领域作了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7年，先生以农业科学家身份应邀出席最高国务会议，并在会上发言，对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先生治学严谨，勤于探索，晚年对我国，特别是西北的水土保持问题极为重视，曾发表《我国水土保持的历史研究》一书，并着手编写《中国水土保持学》。为了收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的第一手材料，曾赴陕北、云南等地进行实际考察。由于年过八旬，积劳成疾，云南调查归来后就卧病不起，临终犹念念不忘水土保持研究这一未竟之志。

先生去世后，陕西省举行了追悼会，中央领导胡耀邦同志等以及国内知名学者纷纷来电悼念，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等都送了花圈。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学有专长与在教育方面成就卓著的爱国知识分子的重视和怀念。